

我所了解的甘谷民盟组织的诞生与发展

王 建 贞

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史写照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始于抗日战争、民族危亡之际，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剿共，发生了皖南事变。就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在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指导下与三党三派（中国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以及后来投靠了国民党的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领袖共同协商时，在陪都重庆特园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延安的中共中

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热烈祝贺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九月，为了迎接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的问题，政团同盟不相适应国事，则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提出：“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盟和国共并列提了出来。

一九四六年元月，重庆召开旧政协会议，二月十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重庆校场口血案。之后捣毁了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民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其原因是在协商期间中共与民盟意见同轨，国民党无缝施以阴谋和破坏，达成五项决议，有利于人民，不利于蒋介石独裁。山雨欲来，无奈之际，则施以卑鄙手段制造了血案和捣毁人民的喉舌。反动

派把中共与民盟并在一起，这也是民盟莫大的光荣。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民盟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达成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协商。这一谅解开创了中共与民盟政治协商的先例，其后中共与民盟共同提出要求，在拟议国府委员会中，保证中共、民盟共同保留三分之一的否决权。在未来的国民大会中，中共、民盟共同保有四分之一的否决权。这是中共、民盟在政治上互相信任的一项重大行动。上列只是简略说明民盟在中共领导之下，与中共在实际问题中“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实例。

二、中国民主同盟在甘谷的诞生

一九四六年六月份，贾耀如、曲溥、王坤一等同志在西安军官总队社会服务处，由先烈孙寿铭介绍参加了民盟的组织。时值蒋介石不顾八年抗战造成民生凋蔽，国家急需团结，消灭战争创伤，恢复祖国锦绣前程。竟撕

毀旧政协决议，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人民最敬仰的中国共产党，实行蒋王朝法西斯的独裁专政，“安内攘外”就是蒋介石行政最高倡议和口号。但这是违反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是被觉悟了的中国人民极端厌恶所唾弃的反时代的错误措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造成有志之士群起向蒋介石政权进攻，向共产党所指引的正确的建设新中国的道路而靠拢。

孙寿铭当时公开身份是西安军官总队大队长，他为了便于号召西北青年，掩护民盟组织，起名“西北青年民主促进会”，这就是贾、曲、王等由西安带在甘谷的“中国民主同盟”前身。曲溥、王坤一是怎样联系上孙寿铭的？先是贾耀如认识孙，也认识一九四五年参加民盟的王协一。曲溥、王坤一通过贾耀如、王协一认识了孙寿铭，这才介绍曲、王（坤一）参加民盟组织。当时景色极为严密，由孙寿铭先烈的夫人在门外化装掩护（因孙随时都在特务的监盯之下），经填

表审核和宣誓后，即由孙寿铭宣布为“西北青年民主促进会”会员，并交代转业要转在自己家乡，以便发展在乡军人，壮大革命队伍。随后，曲溥、王坤一介绍卢育豪也参加了盟组织。一九四七年三、四月份军官总队结束，贾耀如、曲溥、王坤一回至甘谷，先后发展了杨潭基、张伙明、武宗周、李从正、王生元、张子厚、王维昌（和政人）为盟员，又发展了苟明颺、魏健雄、黄明义、李汉三等。中共天水、甘谷地下党负责人董邦同志主动领导了民盟组织，并培养党员。甘谷地下盟员同志曲溥、王坤一、贾耀如经常掩护省、地、县党员东奔西走、跋山涉水，在困难时期进行革命活动。有次旧县政府一自卫队员对曲溥说：“董如意在石嘴背后拿的枪，据说找寻坏人”。曲当面制止说：“董和我是好朋友，你不要多管闲事”。一九四七年十月至十一月份董将贾、曲、王等同志发展为中共党员，由曲溥又发展杨潭基为中共

党员，从此民盟甘谷组织的领导更为坚强。

三、民盟甘谷组织的革命活动是在陇南地下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当时正是甘谷国民党当局喊叫成立在乡军人会之际，董邦同志指示，在乡军人会的领导，要设法掌握在中共和民盟组织成员手里，刀把子和枪杆子绝不能让国民党独有。所以在成立在乡军人会时，选出了贾耀如为主席，并经董邦报省地下党组织准许备案。通过在乡军人会的关系，推荐了王坤一被任命为县自卫队副大队长，杨潭基、武宗周皆任中队长。一九四九年元月份，由于旧县政府某科长知道王坤一进步情况，密报天水中统特务组织，把王坤一被捕了。贾耀如闻讯后，即逃往兰州，路经马营时，由曲溥介绍了班车，改道去陕北。通过任谦的关系，介绍在陕北学习，不仅提高了本人的政治觉悟，而且增强了民盟甘谷组织对马列主义的

认识，了解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革命。而贾耀如、曲溥同志的家被特务查抄。王坤一被捕后，特务从衣袋中检查出的证据是梁廷俊所填申请参加“西北青年民主促进会”入会表，特务对这张表却不十分追究（实际对民盟起了掩护作用），拷问的是与共产党的关系，王坤一承认了表上的名称，并承认了自己是邓宝珊介绍加入的。在特务继续逼讯之下，王供出了自己与曲溥有“西北青年民主促进会”的联系，自始至终没有供出与地下党的关系，维护了党的组织。同年三月份，王协一（党员、盟员）、李从正（盟员、党员）研究，在东梁上杀掉一特务秘书，以挽救被捕的党员、盟员。由于监狱中同志传出意见，恐怕灭鼠损器，他们受敌特的烤打，甚至置之死地，故改作缓和营救。李从正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份，以他的镇长身份，率领自卫队在六十店子借查店名义，查出了特务五、六人，有的急忙逃跑，被从正

枪决一人，把其余人捕在水旧政府，旧县长还把从正表扬了。由于特务检举揭发，从正承认误会，说他们是土匪，因为没有身份证，又携藏手枪。所以从正的腿子虽然打伤了，生命保存下来。

从我写的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凡是参加民盟的同志，事先都有接近、靠拢和爱护党组织的表现，有的与地下党员结成亲密无间的好友，受其薰陶。有的与地下党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直接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开展的活动。因此，我说民盟组织在甘谷的诞生发展与党的领导、扶持是分不开的。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民盟甘谷县区分部成立，张子厚为主任委员，陈俊伯为组织委员，王建贞为宣传委员。下设中学、小学、机关三个小组。此时盟员有贾耀如、王坤一、杨潭基等四十八人。

革命烈士李彦生平简介

衡 彬

李彦，男，又名李世德，一九〇〇年生，甘谷县城关镇人。他在合水县任国民党警察局长期间，受刘志丹等人革命思想的影响，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甘谷最早的党员），并率领部分思想进步的国民党公安人员，携带枪枝弹药，参加了刘志丹、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等人领导的游击队，在南梁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一九三三年十月，南梁根据地派他带领二十多人的赤卫队，在雷家沟一带开展活动，组织建立了富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并发动群众惩凶除霸，分粮，分财产，济贫民。十一月，为了以革命的武装打击反革命的武装，他又在南川帮助创建了二十多人的赤卫军，

后在赤卫军的基础上成立了游击队，在富县各处袭击国民党地方军和地主、民团的武装。一九三四年三月，南梁根据地又派他和陈国栋、兰志敏等同志在小河子暖泉寺召开代表会议，李彦代表苏维埃南梁政府，宣布正式成立了富西革命委员会，任命韩民奎为主席。同年十一月，华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李彦担任副主席，随之，他又组建了四个区政府。一九三五年二月，他又接任苏维埃甘洛县政府主席。李彦同志在几年的革命活动中，一边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宣传革命真理，一边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为谋求解放，他跟随刘志丹等同志，领导当地人民，坚决肃清地主、恶霸的反动武装，惩治贪官污吏，摧毁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封建势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面对国民党地方军仇子康、庆阳民团谭世麟和马鸿宾等部先后对根据地的几次大兵围剿，他们组织动员游击

队、赤卫军和人民群众，配合红军多次进行残酷激烈地反围剿战争。不幸，李彦同志于一九三五年为革命壮烈牺牲，时年仅三十五岁。

怀念哥哥原烨

原 耀

我的胞兄原烨，去世已经四十年了。回忆他的生前，虽然仅有短暂的四十年，然而他的人生历程，作为弟弟，却是值得我久久怀念的。因为他不仅才华出众，而且更值得我崇敬的一点是从高中读书阶段算起直至生命终止，自始至终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在党的旗帜下，在旧中国的黑暗时代里奋斗前进！

早在一九三〇年，母亲带着我从北京回兰州探望祖母，几经往返，以后我稍懂人事时，便从母亲口中得知：烨兄是我第二个哥哥，大哥早已亡故了。烨兄自幼聪颖过人，早期在北京住家时，求学于北京艺文中学，后因政治原因，艺文中学被查封关闭，他便

又转到北京志诚中学就读。

一九三五年，我随母亲在兰州生活、读书，父亲在邓宝珊军队新编第一军属下行医，但也不常在兰州居住。记得就在这一年，母亲收到来自北平同乡家的电文，得悉：“原烨因在京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宋哲元部拘捕入狱，须速营救”云云。母亲焦急万分，当即携我去兰州旧街道名称叫下东关的邓氏住宅，求助于邓公，邓即通过河北各方关系转电致宋哲元，几经周折，遂被释放，继续读书。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哥哥原烨随同甘肃留京学生向内地撤回，途经西安便在亲戚家逗留，并由此辍学，继而在杨虎城将军所属教导团工作。据我所知，在该团期间，由该团团长李震西第二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是在北京读书阶段），不久，关于他的婚事要操办，西安当时有个老姐姐原文华协助他一手操办和邢华嫂嫂结婚。

婚后，嫂嫂和他一同来兰州与父母及弟兄姊妹相聚，时在一九三七年底，当时我家住在兰州小稍门内中街子二号曹姓居宅（现在街名仍旧）。

回忆哥嫂一到兰州，家里便热闹起来。一时平、津、沪、汉外地读书的青年学生，大都相聚我家，记得清楚的是：他们在一块相继组成什么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妇女慰劳会，血花剧团等。青年男女在我家出出进进，他们热心的是办墙报，搞油印刊物，组织公演话剧，总之一目标是唤醒群众，为了抗日救国贡献力量。嫂嫂邢华和二姐原忻（又名原振华）常常一块去贺耀祖夫人倪君（记不起名字了）那里去，据我回忆她们最相熟的是一个妇女慰劳会的成员名叫刘杰（以后我知道她是孙作宾的爱人）的同志。来我家的男同志里我记忆最清晰的有聂青田（天水人，解放前遇害）、黄键（甘谷人）、甄载明（天水人）、宋尔恭（甘谷人）等，老一

代和父亲常来往的有当时兰州女师的教师马济川（陕北人，解放后任兰州西北革命大学校长，是原炳的入党介绍人），还有不时过路来往的吴鸿宾（回族、天水人）等。

至于哥哥原炳呢？他当时在家庭成员中来说，是父母最担心的成员，因为自从他和嫂嫂邢华由西安来兰州以后，就遭到当时公安局长马志超（陕西人，据父亲告诉我们这是特务头子戴笠专门安插在兰州的鹰爪）的“青睐”，凡正明的暗的，对我们的家庭没有少光顾过。父母对他的子女搞的事业是支持的，尤其父亲他本人就是老同盟会、兴中会的成员，是反蒋人物，而且和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谢老（谢觉哉）过从甚密，所以他对哥嫂、姐姐们搞的工作认为是正义的，但他清楚地又认识到兰州是一座虎穴，我们的家庭当时风扰大，他们总是天天操心。当时兰州，白色恐怖气氛越来越浓，记得在一九三八年秋后父亲要求哥哥携带邢华嫂嫂设法去陕北寻

觅他的亲家邢肇棠将军，对他们来说比较妥善，对家庭来说可以分散减少政治压力，但哥哥通过道理说服了父亲。可就在这以后，哥哥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九年解放，便开始了不平静的十年政治生涯。今天静定思动，我认为也正是在敌人鼻子底下被监视“考验”的漫长岁月里，通过艰苦的历程，才能显示出他超群的才华，也正是通过他这个具体的人，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所培育的优秀儿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确、光荣。不论在怎样的情况下，他一直到生命垂危，他对党的信仰没有动摇！

记得一九三八年秋，有一个名叫寇永吉的壮实中年人来我家找父亲找哥哥，据说要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省支团部，征求父亲的意见同意哥哥去参加工作，经过多次纠缠，哥哥最终答应了（日后清楚地知道是党指派他去的，在日后的一些事实中也足以说明他的作为）哥哥也去了三青团部，但这一行动

并未终止敌党敌特对他对我们家庭的监视，相反加深迫害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姐夫甄载明第一次入狱就是在我家被便衣特工叫去（后来才知道那次是押在新关11号地下室），以后被邓宝珊将军保释的。

一九三九年日机轰炸兰州，我和二姐原炘分别随学校迁往临洮、洮沙，哥嫂也被三青团派往临洮，过一两年又派往夏河，后由夏河调陇西调天水，先临洮后至天水，名义都是县分团部书记，在水天大约是四二至四四年春。一九三九年秋以后，兰州白色恐怖加剧，父亲便和母亲商量由兰州迁往甘谷家乡金川，准备渡过晚年，但实质上父母为子女没少操一点心，对革命事业也没少尽他们自己的一份力量，因为从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九年十年中哥哥没有停止给党搞艰巨的工作，父亲也在不停地和地下工作人员联系，支持掩护他们的工作。一九四三年邢华嫂嫂因肺病从天水回到金川家乡看病，在卧床期